



蒋介石对母亲的追思

——《蒋介石日记》解读之四

□ 陈红民 傅 敏

台湾著名风景区日月潭有个景点叫“慈恩塔”，该塔采中国传统宝塔结构，建在海拔 954 米的沙巴兰山上，塔高 46 米，塔顶高正好 1000 米。慈恩塔高耸入云，登顶可将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是日月潭的地标性建筑。慈恩塔所以有名，因为它是蒋介石为纪念其母所建。蒋介石退到台湾后，于居室内供奉其母遗像，每天“亲沐慈恩”。1960 年代末，已年逾八旬人近黄昏的蒋介石对母亲的感念日久弥深，决定在日月潭建永久性的建筑，纪念母亲外，也让台湾民众要“克尽孝道，永怀慈恩”。蒋亲自指定规划设计人员，修改设计方案，在塔对面专设一建筑供奉蒋母王太夫人之灵位。工程过程中，他又多次到现场视察，并亲笔题写入口的“慈恩塔”匾额。慈恩塔选址十分讲究，除了地势高外，与蒋介石在日月潭的行馆涵碧楼隔湖相望。作为蒋介石纪念母亲的永久性建筑，慈恩塔于 1971 年蒋母辞世 50 周年时竣工。当年 4 月清明节前夕，蒋携家人到慈恩塔祭拜其母。

蒋介石与母亲的关系，以往研究蒋的著述均有大量描述。其中，既有极尽美化的官样文章，将蒋对母亲之“孝”吹捧为世人应当效仿的模范标杆，亦有刻意丑化蒋介石，将其描绘成表里不一的“逆子”。有一些著述虽能较为客观地叙述蒋对母亲尽孝的言行，但也很难深入蒋的内心世界，了解他对母亲的真实情感。那么，蒋介石对母亲的怀念是偶尔有之还是长存心中，他会在什么样的心情境遇下思念母亲？在蒋的私人世界中，究竟是如何回忆自己母亲的，对母亲怀有怎样的情感？对亡母的悼念在蒋跌宕起伏的从政生涯中起过什么样的作用？通过对散落于《蒋介石日记》各处的忆母文字的解读，多少能提供一些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或可弥补其它史料之不足，以了解蒋介石丰富的感情世界。

一、蒋介石在何种情形下想念自己的母亲？

蒋介石幼年时，祖父、父亲相继故去，蒋家家店产业一夕之间压在蒋母一人肩上。蒋介石惟一成年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薄情寡义，其父临终前嘱其孝敬继母（即蒋介石的母亲）并顾其幼弟幼妹，蒋介卿非但未能遵从，反而在其父病逝后仅三年便提出析产分家。此后，蒋介石母子相依为命，生活更加不易。随后几年，蒋介石的幼妹、幼弟又相继夭折，对蒋母打击甚大。尽管厄运连连，蒋母仍苦苦支撑析产后分得的微薄家业，为抚育蒋介石煞费苦心，将所有的希望和全部的心血都寄予儿子身上，望其光耀门楣。蒋介石少年时的家庭温暖与教育，全部来自其母，母亲对他成长的影响，无人能及。对于母亲养育的艰辛与苦心，年少的蒋介石虽不能完全体会，但成年后却对其母思慕至深，感恩之心也与日俱增。自其母辞世后，蒋便誓言“无论阴历阳历，凡为母亲忌辰之日，不食荤、不动气、不御色，以为终身自惩自戒，冀减不孝之罪于万一”（《日记》，1922 年 6 月 4 日）以示对母亲的纪念。

每年母亲忌辰前后几天，蒋常常连日叨念。除去祭祀，他也将此作为自我激励的机会。这在蒋的日记中有清楚的反映。如 1931 年在其母忌辰之前两天，蒋在日记中记：

后日是先慈忌辰，孤衷罪孽深重，永无赎罪之日，亦永无乐趣矣。追慕曷极。（《日记》，1931 年 6 月 12 日）

第二天，蒋又记：

明日为先慈忌辰。呜呼，愧为不肖之子，尚何颜立于天地之间耶？（《日记》，1931 年 6 月 13 日）

次日，蒋再记：



今日为先慈第九忌辰矣。(《日记》,1931年6月14日)

有时,在其母忌辰过后还会记,如蒋在1932年6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

昨日为先慈十一周年忌辰,余卧病在床,但有忏悔悲戚而已。甚望国人不以余之不肖为法,以忠孝为自救救国之本也。(《日记》,1932年6月14日)

1941年是中国全面抗战的第四个年头,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处于艰难的抗日相持阶段。6月5日,日军对重庆的空袭造成近万市民惨死在大隧道中,蒋于次日亲自前往视察并安排善后工作,当此万事缠身之时,他仍自重庆发电报给在江西的蒋经国,嘱其拜祭祖母:“祖母阳历忌辰十三日已过,未知阴历计算忌辰在阳历何日?查报。望于阴历忌辰日,在赣遥祭。”1949年6月14日,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已如日落西山,被迫下野后的蒋介石虽已身处台湾,却仍携子遥祭母亲,此有蒋经国所记为证:“今日是先祖母忌辰。清晨随父作祷告纪念。十二时三十分,随父自高雄出发,车行约一百一十公里,三时三十分到达四重溪,……周围景物,酷似江南。”(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湾正中书局,第212页)

不但母亲忌辰蒋记挂心中,母亲的诞辰,蒋也始终不忘。在1934年12月15日的日记中,蒋有如下记录:

正午由京乘机出发,以天阴故,飞行甚慢。二时半到沪,六时到杭转奉化故乡,以先妣七十一岁诞辰,连夜十时半到家祭亲。(《日记》,1934年12月15日)

从这次回乡行程的时间看,显然蒋是挤出时间回乡祭母的。在他出发的前一天,国民党第四届五次中央全会刚闭幕,应有诸多政事需蒋安排处理。但蒋仍一路马不停蹄直至当晚十时半才赶回家,只为能在母亲71岁诞辰当天祭奠。如心中无对母亲的至深感情,莫说如蒋这样日理万机的政坛要人,即便是无杂事缠身的自在小民也未必能行至于此。

此外,每逢清明节蒋介石便记挂回乡扫墓之事,尽管身处要职,他仍尽一切可能回乡祭母。1931年,因蒋介石扣押胡汉民而致反蒋力量趁机聚合,并对其政治权威形成极严峻的挑战,蒋仍坚持回乡扫墓,这在他检讨自己应对此次危机不当时的总结中有所反映。

在他的自我检讨中,认为曾有三次机会或可阻止这次粤变的发生,一是“亲往江西剿共”;二是“坐守京都都不回乡扫墓”;三是在“孙哲生夫妇辞行时”,“能察言观色,留其在京”。而他都未能把握,终因内外交迫,被迫于是

年底第二次下野。由此可知,他对母墓的祭扫不仅常记心中,而且极为重视。

清明节是传统祭扫先人的日子,蒋自然会想到母亲。1922年蒋在桂林无法回乡,他于清明节前写信给蒋经国:“清明节近,我大约不能回到家中来拜扫祖母的新墓,心甚不快。到清明一日,要你托才火伯伯,到祖母坟上多种几百株树。”(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湾正中书局,第87页)

蒋介石对母亲思念的文字散见于日记各处,他对母亲的思念会因各种情事勾起。如在1931年5月11日的日记中,蒋记道:

每见送来各处土产,辄悲母不能亲见,而于西藏番僧拉麻等所送来之供养谷物,更悲戚。如母在侧,必欢乐不置也。(《日记》,1931年5月11日)

“每见”二字反映了蒋思念母亲的频率,每逢有人送土产来拜望,便会想起母亲。为什么会想到母亲呢?因为母亲若能亲见四处有人送来土产,自能体会到儿子的成功,一直对蒋寄予厚望的母亲必会“欢乐不置”,因此才“悲母不能亲见”。日记中所反映的情形应是蒋自感得意的情形,可见,在他成功得意之时,他也会想起母亲,哀叹母亲过世太早,不能亲见自己颇有所成。

与朋友欢聚时,蒋介石也会想念母亲,蒋在日记中记:

今日为耶苏圣诞。……下午,约小学生来慈庵唱歌。晚,约友欢聚,时念慈母并念经儿。(《日记》,1931年12月25日)

遇有与母亲有联系的事情发生,也会勾起蒋对母亲的思念和回忆。如宋美龄母亲过世时,蒋在日记中记道:

上午,得各方消息,证岳母已弃养,不胜悲伤,中国又缺一贤母矣。乃即成服。”(《日记》,1931年7月26日)

当时蒋在江西南昌督战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在前线得知岳母在青岛病故,却无法赶赴岳母身边,蒋便在日记中记自己对岳母的“弃养,不胜悲伤”,并称颂岳母为“贤母”。但日记中的“又缺”二字显露出蒋由此事联想到生母的去,从中不难体会生母在他心中是中国贤母之首的意味。三天后,蒋在日记中一面对于“岳母灵柩今晨由青岛抵沪,余不能亲迎,聊尽婿情”,表示“不胜歉惶”;一面还不忘在赞誉岳母是“贤母”,对“此贤母也,今竟弃养”表示“痛哉”的同时,赞颂自己的母亲,称岳母是“除家母以外,实不多见”的一个“贤母”。(《日记》,1931年7

月29日)母亲在他心中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二、蒋介石是如何回忆母亲的？

由寡母艰辛抚育成人的蒋介石时常忆起自己少年时顽皮闹事,惹母动气,并自愧不已,悔恨非常。一日,蒋介石读完《离骚》,又勾起他对母亲教养自己的一段往事的回忆:

余于十五岁成婚之日后,必奉茶于亲属,余母睡眠掩涕,不肯起而接茶,微闻母泣之声,余乃情不自禁,亦痛哭不置久久。母乃泣训曰:余自汝父逝世,教养汝至今日成婚,汝不知(以下内容写在3月15日页面上——引者)余有多少伤心事。愿汝成年立业,不忘为母者今日教养汝之苦心也。余闻此痛泣,更难成声。呜呼,寡母伤心事谁能知之,中正不孝之罪,一生莫赎矣。此泣为天性最伤悲之表现,而与十三岁夏回□□□(三字无法辨识——引者)泣与母吾之泣,平生之泣,以此三者为最甚也。(《日记》,1931年3月14日)

在日记中虽看不出蒋母此次伤心所为何事,但伤心源自蒋介石的不孝却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此次把蒋母气得不得轻,以至于蒋按例到母亲房内奉茶时,母亲也并不理会,只是躺在床上“掩涕”。蒋母虽无意让儿子看到自己的悲痛,但蒋还是在“微闻母泣之声”后,心中顿生愧疚之意,以至“情不自禁,亦痛哭不置久久”。蒋母听到儿子长哭不停之后,这才开始“泣训”,听了母亲一番训斥,蒋更觉愧对母亲,以至于“痛泣,更难成声”。蒋在日记中对母亲当时的情绪及对自己的教训记述得如此详细,所费笔墨之多几与对当年重大事件的记述相当,令人不难体会蒋此时对母亲的思念之切。而蒋随后对自己“不孝”行为的反省更是深刻,甚至过于苛刻,他称自己的“不孝之罪,一生莫赎矣。”这种对自己不孝的反省,在日记中曾多次出现。字里行间蕴含着蒋对母亲的深深歉疚之情。值得注意的是,蒋在日记中称“余于十五岁成婚之日后,必奉茶于亲属”,对于如蒋这样一个顽劣非常,且正处于叛逆期的少年来说,尽管时常“犯错”,惹母伤心,但始终能坚持每日奉茶,遵守对母亲的孝道礼仪,足见母亲在他心中地位之高。

在当天的日记中,蒋称此为他一生中发自肺腑的三次悲泣之一,另有两次悲泣,即“十三岁夏回□□□泣与母吾之泣”,其中虽有三字难以辨识,但从时间上看,应当都与其母有关。蒋虽经历诸多风浪波折,却认此为平生最悲之事,在他看来,触动最深处情感的事都是与母



蒋介石与其母亲王采玉在宁波合影

亲联系着的。

蒋介石对母亲的回忆文字中每每感念其母持家育子的辛酸:“回忆幼年,……念及寡母孤儿之苦痛,不能为怀矣。”(《日记》,1931年3月22日)。1936年,蒋介石在年届50岁时写就《报国与思亲》一文,回顾:“中正九岁丧父,一门孤寡,茕子无依,其时清政不纲,吏胥势豪,夤缘为虐,吾家门祚既单,遂为覬觐之地,欺凌胁迫,靡日而宁。……与此之时,独赖吾母本其仁慈,坚其苦节,毅然自任以保家育子之重,外而周旋豪强,保护稚弱,内而辑和族里,整饰户庭,罔不躬亲负荷,谨慎将事”。1964年,他在纪念母亲百岁生日时又追忆:“先妣一生守节抚孤,保家教子,凄怆悲戚之情状”,念及“九岁丧父之时,一门茕茕孤寡,覬觐既多,迫辱备至。先妣乃备其坚贞自信之一念,当家难之迍邐,独以一身任之。抚孤成立,再造吾家,当时吞声饮泣,枕上泪痕,茶蘖茹苦,灶间晕厥之惨状,髣髴目前,拊心追慕,益增怛惻。”

有意思的是,蒋在1935年的日记中也有关于十五岁那年母亲教育自己的大段回忆。同是描述十五岁那年母亲因自己犯错而进行的教育,但其中的意旨韵味却完全不同。

蒋回忆对自己的不成器,母亲心忧如焚,爱之深,责之切,因而对蒋“痛笞”。但对母亲的痛笞,蒋并不讨饶。母亲见此,“忧楚益盛,及至最后”,母痛哭“望儿讨饶”,仍不能令其屈服,蒋“仍硬颈如石,毫不求恕”,任凭亲友劝说,毫不为动,并称“母愈打则余愈不讨饶,虽死不变”。亲友问他,如何才能讨饶,他答称,母亲不打,才会



讨饶求恕。蒋在此处并没有提自己因何犯错，叙述的重心并不在于对自己犯错的悔过和对母亲的歉疚，而是在于回顾和审视当日母亲“痛笞”自己这一教育方式，而且强调由于这一次教育受挫，“自后母亦不再打余”。显然，蒋不认同母亲当日用简单的暴力管教自己的方法，并以此反省总结教育子女之法，得出了一条教育子女之道首要在于“研究儿童心理”的结论。看来，母亲在蒋心中的地位虽重要崇高，但蒋倒也不是对母亲的一切言行迷信盲从，不加分辨的愚孝。偶尔，他还能从对与母亲相处之事的回忆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来。

三、悼念亡母对蒋介石处世有何作用？

自父亲去世后，蒋介石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对其母极为依恋，以至于每次出门离开母亲都极为不舍。据蒋1930年在日记中记述：“自我有知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舍弃我母，到十六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这种恋母情状实在令外人所难以想象。他与宋美龄结婚后，甚至试图从妻子身上寻找母亲式的安慰，“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惶，惨恼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而这种深深的恋母情结连他自己都“诚不知其所以然也”。（《日记》，1930年12月4日）

在蒋介石的感情世界中，对母亲的怀念实际上已经超越具体的母子情怀，而是升华到一种精神寄托与力量源泉。母亲虽已离世数年，但在蒋介石心中她始终不曾离去，并一如既往地陪伴支持他，这或许也是他后来每当遭遇挫折伤害都要回乡憩息在母墓之旁的原动力。

蒋对亡母的悼念常与对自己的鞭笞激励联系在一起，如他在1929年日记中所记：

人类之幸福，及使内忧外患与日加增，为党国之故，而谤毁集于一身，不惟无益于民生，而且为军阀盗贼及一般亲友作奴隶牛马，人格几将丧失殆尽。其将何以对我所生也，小子免（勉）诸，无忝所生乎。（《日记》，1929年12月31日）

1931年蒋在母亲忌日这一天记曰：

今日为先慈忌辰矣，呜呼，何日得报！如不为人类与党国努力效忠，何以能对所生也。勉之，勉之。（《日记》，1931年6月14日）

蒋如此感叹之日，正是反蒋力量重新组合聚集，对其统治权威形成极大挑战之时。1931年5月底，反蒋派在广州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形成宁粤

对峙的局面。同时，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失利，此时正部署筹划第三次“围剿”。国内政局混乱，国外又生事端，日本以“中村事件”（即日本参谋本部的中村震太郎大尉非法潜入中国进行间谍活动被当地驻军截杀一事）为借口，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中日关系十分紧张。处此内忧外患之境，蒋也需要调整情绪，振奋精神，以应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因此，他以回报母亲养育之恩，不辜负母亲的谆谆教诲和期望为动力，在心中勉励自己“为人类与党国努力效忠”，“以能对所生”。两个“勉之”显然是他想以此对自己强烈地激励和警醒。蒋介石1964年在文章中回忆自他25岁以后，“吾母苦撑坚忍，而使吾家由剥而复之开端”，随后笔锋一转，自勉道“以家喻国，家难益甚，而志者，其必愈能精勤砥砺，刻苦奋进，以自免于怠荒暴弃。国忧愈深，更将致力集义养气，负重致远，以自拔于颠危险阻之境。”可见，母亲一直是他身处逆境时顽强进取的精神动力。

对母亲的祭奠还是蒋介石寻求心灵安宁慰藉的一个重要方式。蒋在日记中记：

近日来军政繁忙，自觉心力交瘁，非暂离京休息，必致败误大事，不仅徒劳无益而已。故急望回乡扫墓，以慰先人之灵也。（1936年3月20日的本周反省录）

每个人遇有强大压力时，都会寻求减压释放，而减压的方式和渠道却各有不同，有人以娱乐消遣为纾解的方式，有人以会友交流为减压之道，而以蒋介石此时的身分地位论，这两种方式都有难行之处。那么他能以何种方式排遣压力呢？每当他“自觉心力交瘁”时，“回乡扫墓，以慰先人之灵也。”此“先人”自然是指其母。事实上，蒋介石祭母减压的方式几乎伴随他从政沉浮的一生。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的当天，便赶回家乡，养精蓄锐，积极谋划，成功地实现了东山再起。1931年12月，蒋在内外夹击下被迫下野后，又立刻赶回溪口老家，并再次成功复出。1949年，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后，更是以溪口老家为基地，遥制“代总统”李宗仁，掌控政局。母亲安息之处看来正是蒋介石的避风港和重新启航之地。

（作者陈红民为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傅敏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沈飞德

下期“《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五”预告 蒋介石围绕蒋经国归国的感情纠葛。